

汪伪群奸

祸国纪实



PDG

目 录

前言.....	(1)
---------	-------

我所了解的汪精卫

——侍卫官十年杂记.....	许少泉 (3)
伪廷后任首脑陈公博.....	耿力元 (18)
汪伪“总军师”周佛海.....	郑冬敏 (43)
伪廷“慈禧”陈璧君.....	康英夫 (64)

大汉奸褚民谊.....	盛星辉 (76)
汪伪重臣梅思平.....	周 红 (86)
伪政权吹鼓手林柏生.....	蔡德金 (105)
短命的伪安徽省长林柏生.....	汪春溪 (135)

梁鸿志与伪维新政府.....	陈器伯 (140)
梁鸿志二三事.....	黄萍荪 (145)
华北大汉奸王揖唐.....	怀 然 (152)
陈群其人.....	李文滨 (163)

“公馆派”宠臣陈春圃.....	夏 蓓 (178)
寡信善变、贪婪阴险的罗君强.....	夏 蓓 (183)

2017/18

我所知道的罗君强·····	林克展 (196)
伪教育部长赵正平·····	严幼文 (200)
巨奸缪斌伏法之谜·····	何国道 (210)
南京特别市长周学昌·····	蔡德金 (221)
臭名昭著的傅筱庵·····	林中庆 (238)
伪山东省长马良·····	马作幸 (250)
汉奸省长倪道良·····	张培尧 (254)
死心效敌的李思贤·····	洪卜仁 (259)
为虎作伥的伪省长唐仰杜·····	朱承山 (267)
寡廉鲜耻的大汉奸叶蓬·····	吴 名 (271)
汪伪实力派人物任援道·····	程子潇 (286)
熊剑东与黄卫军·····	朱绍文 (294)
伪淮海省长郝鹏举·····	祝镜如 滕开君 南 人 (306)
“清乡”专家张北生·····	俞煥煌 刘才盛 (316)
阴险狡猾的丁默村·····	陈 娟 (327)
“76号”魔头李士群·····	姜颂平 (343)
黄自强与汪伪特务组织·····	杨蔚云 (369)
苏成德浮沉录·····	邵泽言 (374)
汪伪特工急先锋——马啸天·····	肖三石 (390)
吴四宝、张国震先后被烹记·····	周云龙 (401)

前 言

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汪伪“国民政府”，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可耻一页。卖国求荣者，古今中外皆有之。而在中国历史上，汉奸更是代有其人。对汉奸现象的研究，已经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展示其人生轨迹，揭露其卖国罪行，昭示其最后下场，以警示后人，应该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大汉奸群体的汪伪政权，由于种种原因，许多重要汉奸人物的史料，除档案文献和报章的有限记载外，几乎都是一鳞半爪，残缺不全，形成大片的空白。及时地抢救和挖掘这些史料，已成为当务之急。

以征集、整理、编辑、出版中国近现代口述史料（当事人或知情人提供的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回忆史料）为主要任务和特色的人民政协文史资料，理应在这方面充分发挥其填补空白、拾遗补缺的独特优势，作出应有的贡献。华东地区，是汪伪政权及其首脑人物们进行卖国活动的主要场所，正是征集有关史料的重点地区，当然，我们也就有更多的责任在这方面多做一点实际的工作。但就每个省市来说，由于史料的分散、零碎，而无力独自承担起这项任务。有鉴于此，经过第九、十次华东地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的充分协商，六省一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同志决定协作征编出版这本《汪伪群奸祸国纪实》，作为跨省市的地区协作成果，奉献给海内外关心此事的各界读者。

近两年来，在编委会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汪伪重要汉奸

人物的史料征集工作已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共征集史料近百万字，涉及人物五六十人。经过反复比较筛选，最后选定汪伪政权部、省长以上(军队上将衔以上)的党、政、军、警、特要员或劣迹昭著者31人(也有个别级职较低但劣迹累累的汪伪汉奸骨干)，共34篇。其中既有“三亲”史料，也有整理编写的资料，内容力求翔实，文字尽量生动可读，在现已出版的同类题材的读物中，应该说是收容人物最多、资料较为集中和史料价值较高的一本汪伪汉奸专题史料，希冀能因此而填补中国现代史学领域的一项空白。但限于征编时间的仓促、有关史料征集的特殊困难，以及我们的水平，本书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尚望关心此书的专家和各界读者给予指正赐教。

本书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刁仕军	叶炳南	朱向农	朱时雨	刘晓宁
吴志明	范泓	郭天佑	涂苏中	聂国柱
黄平	黄小宁	屠筱武	樊悟纪	

我所了解的汪精卫

——侍卫官十年杂记

许少泉

1931年底，我被挑选任汪精卫贴身卫士，1940年4月升任汪精卫侍从室中校侍从官，1941年调首都伪警察厅任督察长。在长达10年的卫士生涯中，我紧随汪精卫左右，亲身经历了汪精卫“南京遇刺”和“河内暗杀”等事件，以及汪精卫汉奸集团的卖国活动。

陈璧君挑选卫士

我是江西省萍乡市麻山乡大山村人，1913年出生。家乡有习武风气，我也会几下武功。读了一年私塾后，于1929年在萍乡报名参加国民革命军，分配在学兵总队。1931年，我被挑选到徐州警备区特务连任班长兼武术教练。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王均任徐州警备司令。他见我长得高大，又会武术，便把我调去跟他当警卫。不久，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总长兼训练总监朱培德来徐州观察，又把我要去，调到训练总监部，升为卫士排长，半年后就当上了汪精卫的贴身卫士。

那时，汪精卫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部长，为汪精卫挑选卫士的是他老婆陈璧君，挑选对象主要是卫士排的士兵。朱培德亲自向陈璧君介绍了情况，又把卫士排的人一个一个叫去

目测，由陈璧君问我们的家庭情况，然后当场表演几下武术。她看中谁，就要给，朱培德不会说个不字。我不到20岁，个子高，身体又棒，几下武功也过得去，被陈璧君挑选上了。这次被挑选上的还有王长志（山东人）、孙学韩（山东人）、戴云生（湖南湘潭人）。我去后挂中尉排长军衔，月薪50元，比在训练总监部多了近20元。

陈璧君不拘言笑，长得胖乎乎的，人称“雷山老母”，但很有活动能力。汪精卫长得很标致，举止文雅，有美男子之称。汪精卫的卫士，分外围警卫和贴身卫士两种。外围警卫有100多人，设一个卫士大队。大队长周鸿烈，曾在孙中山先生身边当过卫士。外围警卫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盘查可疑人员。贴身卫士主要是跟着汪精卫转，他到哪里，我们就跟随到哪里，布置在他的前后左右。贴身卫士共有20多人，都是从各处挑选出来的精悍的信得过的人。我任汪精卫的贴身卫士后，一直跟随其左右。

张学良踢落刺客手枪

汪精卫每逢外出，随行人员除秘书外，均带有五六个贴身卫士。

1935年11月1日上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礼堂举行开幕式。

吃过早饭，我们几个贴身卫士和秘书分乘一辆轿车和一辆中卡，紧随汪精卫来到中央党部礼堂。会议警戒很严，分几层划定警戒线，由警察、宪兵层层把守。

汪精卫主持了开幕式，并发表了演说。会后，全体中委聚集在会议厅门前合影。照拍完后，汪精卫站起来转身回大厅时，一名身穿防水外衣、胸佩“记者通行证”的人（后知道是孙凤鸣），从记者群中跨过警戒线，右手从内衣口袋拔出六响左轮手枪，朝

汪精卫连开三枪。第一枪从汪的左眉边擦过，第二枪击中腹部，汪精卫应声倒地。第三枪没击中。枪声一响，台阶上秩序大乱。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张学良抢先一步冲过去，飞起一脚，踢落刺客的手枪。汪的卫士桂连轩朝刺客连开两枪，将其击倒。刺客孙凤鸣被送到医院抢救，第二天清晨在医院死去。

汪精卫中弹倒地后，蒋介石闻声赶到。他蹲下一条腿，拉着汪精卫的手关切地说：“凶手已抓到，找出他的主使人，一定要严加惩办。”汪精卫被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首都警察厅厅长陈焯等随行护送。汪精卫听说凶手原来的目的是刺蒋介石的，便对陈焯等人说：“凶手的动机并不坏，要从轻处置，不要判他的死刑。”

我们当卫士的，过去仅知汪蒋之间有矛盾而已，然而矛盾之深，从这次汪精卫被刺后才知道。

陈璧君怀疑刺汪是蒋介石策划指使的，便找到蒋大吵大闹。蒋介石对此事感到很伤脑筋，下令撤了陈焯的职，又组织调查组，追查刺汪的主使人。孙凤鸣是以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的身份进入会场的。通过调查，证实孙凤鸣曾在十九路军任排长，参加过淞沪战役，与金陵大学学生、南京学联理事华克之以及王亚樵等人筹组过反蒋抗日游击队，后在华克之、王亚樵等组建的“晨光通讯社”任记者。蒋介石将调查情况转告给汪的心腹陈公博和陈璧君等，并一再声称，刺汪不是自己人干的。蒋还悬赏10万元，下令通缉华克之、王亚樵。

20多天后，汪精卫被转送到上海一家法国人办的医院。我记得，主治汪精卫的医师是乐尔。经检查，乐尔认为取出子弹费力大，且有生命危险，建议以不取为好，用药物治疗，并保证30年不会出问题。当时，汪精卫的大儿子汪孟晋在德国留学，乐尔建议汪去德国休养。1936年2月，汪精卫就到了德国治病养伤。

汪蒋冰炭不相容

汪精卫去德国后，何应钦把我们调到军政部军官训练班学习。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在国民党内，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分为两派。一派是以何应钦为首的，他们置蒋介石生死而不顾，主张武力讨伐；另一派为保障蒋的生命安全，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

何应钦主张武力讨伐，虽掌握兵权，但他并非国民党元老，左右不了国民党内的局面。在调兵遣将时，他又以国民党中常委的名义，向正在意大利的汪精卫发电报，催促汪迅速回国主持政事。12月22日，汪乘意大利“皇后”号邮轮启程回国。

1937年元月上旬，汪精卫回到上海。我记得去黄浦码头迎接汪精卫的有何应钦、于右任、孙科、居正、谷正纲、钱大钧、朱家骅等国民党头面人物，还有柳亚子、吴稚晖等人。码头上有拿着彩色三角旗的人群，彩旗上写着“欢迎汪院长回国主持政事”等字样的标语。此间，蒋介石已回到浙江奉化溪口老家，当他得知汪精卫回国，到上海时还有这么多军政要员去迎接，因而对此大为不满。听人说，蒋大骂汪说：“我还没有死，你汪兆铭就急着赶回来抢班夺权了！”

汪精卫回到南京，几天后便到溪口见蒋介石。一见面，蒋介石便说：“你来这里干什么呀！不是有好多人拥你回国理事吗？”蒋对汪十分冷淡，汪精卫在溪口讨个没趣。从此，汪在蒋面前一直坐着“冷板凳”。

汪精卫一回国，我又回到他身边。汪对蒋很不满，经常在家里发牢骚，骂蒋介石。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集大权于一身，汪更为恼火，经常在家大谈“没有飞机大炮，抗日必败”的悲观论调。

周恩来致力抗战 汪精卫口是心非

“七七”事变爆发后，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八路军在武汉设立了办事处。1938年2月，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昌正式成立，陈诚任政治部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

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珞珈山召开，邀请了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人列席会议。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但是，汪精卫的个人权力仍然是有其名无其实。汪精卫住在汉口商业银行大楼。为了广泛深入地团结、动员全民投入抗日救亡的战争，周恩来和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也时有往来。我见到周恩来先生多次进入商业银行大楼，会见汪精卫。周恩来向汪精卫分析形势，对时局深入交换意见，希望汪精卫以民族利益为重，抛弃个人恩怨，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去。汪精卫往往表面点头称是，背地里却在策划叛国阴谋。这一段时间里，他对蒋介石的独裁更加恼火，同时对抗日战争的悲观失望情绪也与日俱增。

汪精卫出逃

1938年7月，日军逼近武汉，汪精卫到了重庆，住在上清寺美专。这一段时间里，他表现得非常沉默苦闷，好象有说不出的苦衷。在重庆美专期间，他除了接见德国大使，还在美专、南温泉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大礼堂作过两次演讲外，就再没在公众场合出头露面。在家中，他经常召见陈公博（国民党中央常委、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周佛海（国民党中央常委、宣传部代部长）、梅思平、曾仲鸣（国民党中央委员、汪的秘书）、陶希

圣、高宗武等人，磋商重要的事情。

1938年12月10日，汪精卫把我叫到他房间里。他把门关上，很神秘地问我：“少泉，我对你怎么样？”他这样突然发问，真使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跟随汪精卫已有多年，他和陈璧君对卫士也和善，从来不打骂卫士。而蒋介石一遇不顺心的时候，就拿卫士、侍从出气，不是挨耳光，就是被臭骂一顿。对汪精卫的提问，我立即回答：

“汪先生和夫人对我们都很好。”汪说：“那好。现在我交给你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很重要。”停了片刻，他接着说：“这事不能跟任何人讲，只能完成，不能出任何问题。”

汪精卫对我这样信任，我便毫不迟疑地回答：“请汪先生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接着，汪精卫把具体任务交待给我。

原来，有八辆汽车由重庆去昆明。汪精卫指派我负责押送，随车押送人员由我挑选，12月12日一早出发，六天之内务必到达昆明。汪精卫说完，拍拍我的肩膀说：“此事不得延误，你去准备吧，千万要保密！”从汪精卫房间出来，我心里很纳闷，这个任务怎么这么机密，又这么急？好在我们都是单身汉，说走就走，没有什么牵挂。

回到卫士排，我立即挑选了12个人，只告诉他们准备待命，没有说是去执行什么任务。12日一早，我带领12名卫士和一名副官，分乘一辆卡车（装有汽油），一辆中卡，两辆保险车和几辆小汽车，从重庆启程。副官何连均，负责司机、卫士的吃住和联络，卫士负责车辆的安全。18日晚，我们按时抵达昆明，住进了昆明饭店。

第二天一早，我持汪精卫的亲笔信去见云南省主席龙云。龙云得知我们一路上很安全后，说：“你们都换上便衣，这样比较方便。”其实，我们出发时在重庆都换上了便衣。龙云接着说：“汪先生11点到，等一下我们一块到机场去接。”

不到11点，汪精卫的座机抵达了昆明机场。同机到达的有陶希圣、陈春圃和两位中西餐厨师。下飞机后，汪和龙云一道乘车前往龙云家。中饭后，汪精卫把我叫去，夸奖我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接着又对我说：“你暂时留在昆明多呆几天，把汽车送走以后，再把昌祖（即陈璧君之弟、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厂长陈昌祖）、国强（即陈璧君之侄、飞机制造厂机械处处长陈国强）送到老关（中越交界处），一同到河内来。”又嘱咐我说：“军统在这里有不少人，你千万小心，把工作做好，不要出问题。”

汪精卫在重庆已给我办好了去河内的护照。谈话时，汪精卫把护照递给我。第二天，他便带着陶希圣、陈春圃（国民党侨务委员会教育长）和两位厨师乘飞机去了河内。

我把汽车分别送走后，再送陈国强。因出境不能携带武器，我把手枪交给龙云并向他告别后，便和陈昌祖一道乘火车去河内。一上火车，我们便发现有特务盯梢。火车开到蒙自，陈昌祖被军统抓去。我立即下车给昆明的龙云打电话，要他找军统昆明站交涉放人。龙云在电话里把军统昆明站站长臭骂了一顿。昆明站站长原是汪精卫的老部下，接到龙云的电话后不敢怠慢，马上把陈昌祖送给龙云。

龙云知道这是件麻烦事，若蒋介石过问起来就很不好办。龙云交待属下挑了一部卡车，在车厢铺上个“床铺”，又买了面包，配好茶水，在卡车车厢门上加锁，贴上“云南省政府”的封条，把陈昌祖送出了老关。一切办妥后，我于12月底到达河内。

军统刺汪 蒋特使两赴河内

跟随汪精卫到河内的卫士有赵衍庆、戴云生、桂仲萍、梅甫生和我，还有秘书陈兴陶，六人都是少校以上军衔。另外还有两名厨师，三名杂工，几位女佣。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陶希

圣、高宗武等人也陆续来到河内。汪精卫亲拟的“艳电”，在《南华早报》上发表后，蒋介石立即通过国民党中常委会，在报上公开发表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撤销一切职务的决定。

1939年2月，蒋介石密派谷正鼎携亲笔信到河内，劝说汪精卫去欧洲旅行，出国护照由重庆方面办理，并从香港一家银行拨给20万元作旅费。这封信有七八页纸，与汪精卫称兄道弟。记得大意有，这次作出开除党籍的决定，蒋也是没有办法，是周围压力所迫；并安慰汪不要为此难过，要汪到国外去散散心。

汪精卫读了蒋介石的信，思想有些动摇。但就在那几天，周隆庠（汪在南京兼外交部长时的日语翻译）潜来河内面见汪精卫游说，称日本政府很重视汪的举动，希望汪出来组织新政府，日方代表影佐祯昭（梅机关机关长）、松本重治和清水董三要来河内与汪晤谈。汪精卫又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但没有同意与日方代表会面。

1939年3月，曾仲鸣的妻子方君璧（油画家）和林柏生的妻子（十一姑）从香港来河内，为曾仲鸣做生日。戴笠指派的特务从香港跟踪而来，执行暗杀汪精卫的使命。

为防暗杀，汪精卫早有戒心。他不常住一个地方，有时住在曾仲鸣的小洋楼，有时住在朱培德的房子里。这天晚上，我们都在曾仲鸣的小洋楼里。

这栋法国式的小洋楼有上下两层，汪精卫夫妻住在二楼的左边，曾仲鸣夫妻住在二楼的右边。这天大家聚在一起，既为曾仲鸣祝寿，又为方君璧接风，说说笑笑闹得较晚。汪精卫和曾仲鸣带着太太上楼休息，我和桂仲萍、戴云生、梅甫生在楼下房里打麻将。

大约在深夜12点多钟，几个军统特务翻墙而入……

厨师何兆住在后门口的一间小房里，听到异常响声，便开门张望，特务朝他连开两枪打伤他的左脚。惊闻枪响，我们准备

冲出去，可是房门已被特务堵住。又一声枪响，特务打伤戴云生的左膀，并有几支枪口对准我们威胁说：“不准动，谁动就打死谁！”因出境时不能携带武器，我们都是赤手空拳，加之又不知道对方来了多少人，均不敢冒昧从事。就在这个时候，两名特务上楼砸开曾仲鸣卧室房门，朝曾仲鸣连射十几枪。在楼下警戒的特务听到二楼枪响，便打了两声口哨，特务们便越墙而去了……

我们立即奔上二楼，只见曾仲鸣的卧室房门洞开，床前血溅满地，曾仲鸣下腹部连中数弹，已撒手归西，方君璧躺在床下不能动弹，大腿中了三枪。我忙叫开汪精卫的房门，汪精卫此时吓得脸色苍白。汪问我情况，我告诉曾仲鸣已中弹身亡，汪精卫听后哆嗦地说不出话来。原来，汪精卫听到枪响，知道事情不妙，便翻身下床，和陈璧君一道拖过一只大木箱堵住房门，又躲到了阳台上。

附近的法国巡捕听到枪响，马上乘警车赶到，把房子团团围住搜查……

这次事件后，法国总督府发给我们两支冲锋枪、10支小勃朗林手枪，以防不测。蒋介石发来电报表示慰问，电报内容大意是，仲鸣兄被害深感痛心，凶手如缉拿归案，一定严办。

汪精卫拿着电报给我们看，气愤地说：“这明明是来暗算我的，还来这一套，想推脱责任！你们看到了吧，老蒋好狠毒啊！”他又接着说：“你们跟我都好多年了，现在到了这种地步，你们谁如果想回去，我给何应钦写封信，到重庆去找他，他会给你们安排工作的。”我们不好多说什么，都表示愿意留在他身边，不回重庆。

不几天，蒋介石又派谷正鼎携亲笔信来河内。谷一再对汪说，发生这次暗杀事件，蒋先生确实不知道；对这一不幸事件，蒋先生深表遗憾；蒋先生已向各地发出通缉捉拿凶手。汪精卫听了这些，更加被激怒了，打发走谷正鼎后，又在痛骂蒋介石。

1939年4月，周隆庠带着影佐祯昭、松本重治和清水董三秘

密来到河内晤面汪精卫，商谈组织汪伪政府事宜。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密谋，决定汪精卫离河内去上海，并将赴沪的路线、交通工具、接送等事宜商妥后，影佐祯昭等才离开了河内。

河内 香港 台湾 上海

1939年4月下旬，汪精卫从河内启程去上海。

为提防蒋介石再派特务暗算，决定车辆和人员分两路秘密出发。一路是几辆汽车装载物品经海防过轮渡到香港；另一路是汪精卫及随行人员乘法国总督府的汽车走军用管道到海湾军港，然后乘法国小兵舰走海道去香港。小兵舰事先停泊在距香港不远的海面上，我乘小汽艇上了岸，去通知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等。第二天，陈春圃、高宗武来到兵舰上，一同从香港去厦门。日军派了一艘较大的军舰“北光丸”号到厦门，在厦门把我们一行接上去后驶往台湾。汪精卫在台湾住了两天，拜会了日本的台湾总督。接着，我们又乘“北光丸”军舰驶往上海。5月6日，在日军虹口军用码头上岸。日军梅机关派来一个代表，把汪精卫接上汽车，驶入虹口日军原西尾中将的一栋小洋楼。

以后，汪精卫就住在这栋小洋楼里。洋楼周围由日本宪兵站岗，外人来见汪，均须经日本宪兵允许，连我们这些贴身卫士都不能随便出入。汪精卫整天提心吊胆，既怕受到抗日民众的惩处，又怕遭到蒋介石的暗算。为防不测，汪精卫在兵舰上就要我们抽血，检查彼此的血型，以应付紧急情况。

在上海，周佛海、陈公博、褚民谊、陶希圣、梅思平、李士群、丁默村、周隆庠、高宗武等人经常到小洋楼与汪精卫密谈。还有维新政府官员梁鸿志、任援道等人，南京日本宪兵司令、日本派遣军司令等都专程来沪拜会了汪精卫。在虹口小楼住了约20天，日军将愚园路1136弄原交通部长王伯群的住宅拨给汪精卫做

公馆。王伯群宅是一栋花园洋楼，1136弄是一条很长的里弄。为安全计，特工总部的丁默村、李士群下令，把这条里弄的住户全部迁走，周佛海、陈春圃、罗君强、梅思平等人都迁至1136弄居住。

一切安顿下来后，这条里弄马上戒备森严，李士群派来了特工队驻守，还设有瞭望台，另加派了日本宪兵、便衣警察巡逻，进入必须持特别通行证。

拼凑汪记御林军

到上海不久，汪精卫与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拟定了《关于收拾时局之具体办法》，以书面形式提交给“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办法”中提出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组织所谓“中央政治会议”和中央政府。在人事安排上，周佛海、褚民谊与丁默村、李士群争论不休，后来汪精卫出面圆场，才达成原则协议。5月31日，在影佐祯昭、清水董三等日本人的陪同下，汪精卫、周佛海、高宗武、周隆庠等人乘日本海军飞机由上海去日本访问。

在日本期间，汪精卫一行拜访了日本改组后的首相平沼骐一郎，与日本政府高级官员、陆相坂垣征四郎，海相米内光政，外相有田八郎，藏相石渡庄太郎，以及前首相近卫文麿（时任枢密院议长）进行了会谈。

在成立伪政权的会谈中，汪精卫与日方争论最激烈的是国旗问题。汪精卫坚持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以示其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国民政府之正统，声称他的政府是“还都”南京，而不是重建。日方却坚持要汪伪政权挂五色旗。经过讨价还价，日本方面提出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上加上一块三角形的黄布片，上写“和平、反共、救国”字样。汪精卫等认为这种做法不

伦不类，要求日方取消这个黄布片，而日方决不答应。无奈，汪精卫只有勉强同意。直到1943年1月9日，日本要求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国旗上的三角形黄布片才去掉。

6月18日，汪精卫一行离开日本乘船回国，24日到达天津。汪精卫一回国，便频频与南北日伪政权要人接触，暗面日本侵略军头目。

伪“六大”经过一周多的喧闹，总算结束了。我们这些卫士又恢复了往日的静寂。1939年9月的一天，陈璧君关切地告诉我：“少泉，国民政府快要成立，准备还都南京，需要很多人才。先生要我跟你说，准备派你去广州燕塘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你的意见如何？”我说：“既然汪先生和夫人对我有意栽培，我当然感激不尽，听从安排。”第二天，我正式接到派我去广州军校学习的通知，和我一道去广州学习的还有任孟兴和梅甫生。

我们三人一道从上海乘一艘意大利邮轮先到香港，再乘车到广州。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由汪精卫兼校长，教育长李讴一是德国留学生。全校500多名学员，我们三人分派到三个中队学习，汪精卫的用意是要我们掌握学员的思想动态，监督学员的行动。

1940年3月，汪伪政权“还都”南京。4月间，陈璧君来到广州，找我们谈话。她说：“国民政府已经成立，为了保卫汪先生的安全，要成立卫士团和侍从室，急需人，汪先生要你们提前结业回南京。”这样我们才得知，汪伪正在组建卫士团和侍从室。卫士团编制有1000多人，任孟兴任团长，桂仲萍任副团长，梅甫生任营长，我留在侍从室。侍从室主任是朱赤子少将。侍从室共有30多名侍从卫士，四名高级侍从官是，赵衍庆上校、何连均中校、戴云生中校和我。

日军为加强对汪精卫的“保护”，在汪的住处——颐和路34号的对面，驻扎了从日本御林军中挑选出来的20多名宪兵。